

文章编号: 1006-5342(2007)02-0122-03

从世界看中国的爱国者

——读《西学东渐记》札记*

杨锦奎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通过研读《西学东渐记》, 对容闳在致力于探索救国之过程中的重大表现, 力图作出较细致的分析解读。从他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谋求“教育救国”的方案及其实施以及契合近代历史演进脉络的人生轨迹等几方面, 论述了容闳凭借自幼年开始所接受的西方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留美经历所赋予他的世界视野和眼光, 满怀拯救祖国的热望, 从世界反观中国, 使得他的一生能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前行, 保持思想的前瞻性和实践的先进性。容闳不愧为近代从世界看中国的杰出的爱国者。

关键词: 容闳; 《西学东渐记》; 西学东渐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西学东渐记》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留学生容闳(1828—1912)晚年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 原名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因为容闳在近代西学东渐运动中的卓越贡献, 这本原用英文写成的回忆录在译成中文时, 被意译为《西学东渐记》。容闳生活的时代, 正值中国社会风云激荡, 传统文化面临严重危机、濒临崩解的近代。如何探索解救中国的出路就成为仁人志士共同求解的严峻课题。对此课题, 不同的人交出了不同的答卷。这本回忆录就是容闳的一份个性解答。是故, 通过阅读这本回忆录,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位较早从世界看中国的近代先贤不寻常的人生履历, 特别是贯串其中的为西学东渐上下求索、屡挫屡起、鞠躬尽瘁的那份执著; 而且, 透过他的个人际遇, 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知所折射出的近代波澜壮阔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若干场景以及中国社会新陈代谢、步履蹒跚走向近代化的曲折艰辛。

从1847年1月至1854年11月, 在长达八年的留美生涯中, 容闳系统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教育。但是, 记忆中幼年生活的困窘和祖国的苦难时时萦绕在他的脑际, 令他不能释怀。在反观中国现实时, 容闳明显地感到中国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并为之黯然神伤, “予当修业期内, 中国之腐败情形, 时触予怀, 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 辄为之怏怏不乐”^{[1](P22)}。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下, 个人对社会所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观念已经在容闳头脑中扎下根基, “盖既受教育, 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 而道德之范围亦广, 遂觉此身负荷极重”^{[1](P22)}。通过对中美两国的对比思考, 容闳认识到中国的腐败与压制在于文明之不昌。当他

还身处异国他乡时, 就心忧故土, 立下宏愿, 誓以西学改造中国: “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 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 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 既受此文明之教育, 则当使后予之人, 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 盖皆以此为标准, 专心致志以为之”^{[1](P23)}。

欧风美雨的熏染浸润, 使容闳具有了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明辨是非的正义感。自美归来, 容闳受到的第一次心灵的震撼是亲睹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东的大屠杀, “场中流血成渠, 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 “地上之土, 吸血既饱, 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 汇为污地。空气中毒菌之弥漫, 殆不可以言语形容”^{[1](P30)}的惨状, 令他“愤懑之极, 乃深恶满人之无状, 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 “表同情于太平军, 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1](P31)}。正是在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驱驰下, 容闳开始了与太平军的接触, 迈出了学成归国后探索救国道路的第一步。1860年访问天京之沿途所见, 使他对太平军心生好感, “太平军之对于人民, 皆甚和平, 又能竭力保护, 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 施以极严之军法”^{[1](P32)}, 因此不应把某些地区的残破, 归罪于太平军, “殊不知官军之残暴, 实无以愈于太平军”^{[1](P32)}。他还与当年在香港结识的老友、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两次晤谈, 正式提出了推行新政的七项建议,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 组织一良好军队; 二、设立武备学校, 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三、建设海军学校; 四、建设善良政府, 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 为各部行政顾问; 五、创立银行制度, 及厘订度量衡标准; 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以耶稣教圣经为主课; 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1](P36-37)}这七项建议, 是容闳凭借在西方接受的知识 and 形成的体认, 结合太平

* 收稿日期: 2007-03-23

作者简介: 杨锦奎(1970—), 女, 湖北黄梅人,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天国的实际，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系统方案，涉及现代军队建设、学校教育、政府组织、经济制度改革等大政方针。容闳希望太平天国能接受并施行它，从而在中国开拓出一片文明的新天地。但令人不无费解的是，面对太平天国的“义”王封爵，他终婉拒而去，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归向了曾国藩。

容闳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何以会出现如此变化？细察他对太平天国的“观感”，我们不难找寻到其中的部分原因。容闳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大半个中国，宗教信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太平天国所接受的耶稣教知识，“皆甚浅陋简单。顾虽浅陋简单，而宗教中真实之势力，则已甚大，足使一般无知愚民，皆成为草野英雄，人人能冒危险，视死如归。而能所向无敌，逐北追奔，如疾风之扫秋叶，皆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为之”^{[1] (160)}。在他看来，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朝政治的腐败和黑暗，“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并断言在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所以旨在推翻这一腐败政府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正义性自不待言。但是，另一方面，他从太平军领袖人物的“行为品格与所筹划”中“实未感信其必成”^{[1] (157)}。因为太平军主要来源于“社会中最无知识”之“无业游民”。这种既无知识、又无信仰的军队，“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面对“财产富有而多美色”，则经受不住诱惑，而“道德则每下而愈况”。^{[1] (162)}这样的农民运动，等待它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也是不言自明的了。在当时，容闳能从历史局限上指出太平天国的弊端所在，无疑是可贵的。因为有西方的民主政治这一特定的文化背景作为参照，因为用西学作解剖中国社会的手术刀，所以他在当时能看清太平天国的弊端。因为能跳出中国看中国，从世界反观中国，所以他的识见高人一筹。

在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犹如“埃及石人首有两面”“含有两种性质”^{[1] (161)}的同时，容闳充分肯定太平天国革命对唤起民族国家意识的价值，“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1] (162)}容闳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是非得失的评价客观又不乏深度。

既然已经看到太平天国难逃失败的命运，容闳当然不会把实现其人生抱负的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当然不会贸然接受太平天国的“义”王的荣衔。

容闳对太平天国态度发生变化的另一原因是，他的“救国希望之全部寄托”的七项建议在太平天国中应者寥寥，令他感觉实现“救国希望”的希望委实渺茫。虽然在太平天国中不乏洪仁玕的支持，但在容闳看来，洪仁玕在太平天国中是孤立的。容闳对形势的这种判断确有其合理之处。事实上，由于前方军事吃紧，太平天国的确无暇顾及容闳的改革建议。这时的容闳还是一个十足的教育救国论者，所以，就在退还太平天国封爵印信时，他仍表示“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诸君，苟决计实行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则予必效奔走”^{[1] (157-58)}。对容闳来说，当时的政治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教育计划能否得到实施的机会。正是以此作为权衡的关键，容闳最终在农民起义军和清王朝的某些封疆大吏中选择了后者。

此外，容闳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变化与他的阶级属性亦

相互关联。容闳同情太平军，甚至几欲响应，但“响应”只是一时的决定，“及后深思静虑，乃觉此举卤莽，究非妥善之策”^{[1] (131)}。他到东京也只是看看而已，一开始并无明确的去留意向。他对太平天国虽有赞赏之辞，但随着对太平天国接触的深入，最终还是视之为“十五年夙患”、一场“大乱”。对太平天国得出这样的结论，归根到底与他的阶级倾向不无关系。

二

容闳不仅以西方政治民主为参照，从世界的角度和高度来反观太平天国革命，而且从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中，深感中国要近代化，须从教育入手，兼以经济和政治的全面改革。教育救国思想特别是留学教育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容闳是我国教育救国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推动者。他之所以认为教育乃行之有效的救国之道，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第一，容闳认为，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优秀的治理国家和建设实业的人才。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就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就必须有一批掌握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知识的人才作为改革的倚靠力量。

第二，在中西教育制度的对比中，容闳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是不可能培养出现代化人才的。作为最早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由于广泛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容闳对此体会尤其深刻。1855、1860年，两次回国时，容闳就自然地感到中国的落后，尤其是教育的落后，“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1] (1)}，只允许把孔孟经书当作教条不断摘抄，八股文成为读书人唯一的主课。而美国学校专业和课程设置则十分多样化，有拉丁希腊文化、数学、生理学和哲学等课程，声光化电、轮船、铁路、电报等专业。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形势下，中国急需一批掌握近代科技和西方政治学说的人才担当外交工作。“在国际关系中，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和其他交往中，中国由于缺少受过现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甚至“在许多至关重要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假手于客卿，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塞、军舰、军队、海关，大部分都大权旁落”，“在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协商条约中，竟让美国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充当中国的首席代表，那怎么会是合适的呢？”^{[1] (11)}派遣留学生出国，不仅可以增进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而且长远来看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他非常自信地说：“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 (12-36)}

第三，容闳深感封闭太久的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与世界大势极不协调。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之后正迅猛发展，中国的自我封闭已经使自己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积贫积弱的国家的子民又怎能不受外人轻视？在香港学律遭排挤和在海关谋职受歧视等经历使他感触至深。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了解和学习先进于我的西方。这是林则徐、魏源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就提出的思想主张。但容闳超过他们的地方就在于认识到，派遣学生到外洋先进国家学习不仅可以增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

解,而且有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是学习西方的有效途径。

所以,在致力于幼童出洋留学的努力中,容闳可谓倾情付出,竭尽全力。早在异国求学时代,他就认为“舍此计划(指教育计划)实无救亡之良策”。在1860年向洪仁玕提出的七项建议中,第二、三、六、七等四条就是关于建立新式教育的,诸如: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等。1865年筹建江南制造局时,他就建议曾国藩在厂中设兵工学校。1868年,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他正式向清政府“条陈四则”,“此条陈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即“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2] (86-87)}。1870年冬,由于办理天津教案的机缘,他为之“日夕怀思”^{[1] (P79)}的留学计划终于盼来了实施的那一天。在得知计划终获政府批准时,容闳“乃喜而不寐,竟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2] (P90)}。当此之时,他满怀希望和自豪地视此计划的实施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但是,顽固派不能容忍留学生在外洋的自由发展。担任留学事务所正监督的的陈兰彬思想顽固守旧,视学生参加基督教的活动是叛逆行为,健身跳跃等运动视为不守规矩,剪发辮着西服更看作对清王朝不忠。陈、容之间不断发生矛盾乃至冲突。后任正监督吴子登较之陈的顽固性,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1] (P101)}，“对于已定之成规,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1] (P103)}，他肆意攻击容闳“纵容学生,放荡淫佚”^{[1] (P103)}，说学生“在美国,专好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认为这些学生若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1] (P104)}由于国内顽固势力的遥相呼应,加上美国此时正掀起排华浪潮,吴子登力主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学生。1881年下半年,留美幼童被迫中断学业,悉数“凄然返国”。容闳为之倾注了无数心血的留学计划遂半途而废。

历史的风云际会,使出身寒微的容闳自幼年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结缘,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惯常中国人的人生道路。西方教育的经历尤其是八年的留美经历赋予了他与传统文人迥然不同的视野和眼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容闳把改造中国的立足点放在新式人才的培养上,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把培养近代化的人才作为革除弊政、振兴中国的手段,与洋务派致力于培养为巩固封建统治而效劳的人才的教育观自不可作等量观。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他们合作下的幼童留学的千秋事业最后无疾而终。

容闳的教育计划虽然令人痛惜地夭折了,但这批留学生归国后,把不同于中国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知识、新思想带回到中国,扩大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同时,新知识新思想的渗入对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一定程度上起了分化瓦解的作用。这些留学生虽然绝大多数未能如愿学成,但他们凭借学到的“长技”,回国后服务于各行各业,仍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随着时势的转移,后来清政府也认识到留学的重要,“似亦稍稍醒悟,悔昔日解散留学事务所之非计”^{[1] (P110)},并陆续派学生出洋。于是,官派或自费留学蔚然成风,不可遏止。所以《近代中国留学史》的作者、中国教育史专家舒新城先生说:“无容闳,虽不能说一定无留学,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2] (P12)}

容闳以其教育救国的实践,推动了近代西学东渐的进程。但是也应该看到,容闳的教育计划毕竟是一种改良社会的方策,其教育救国思想终究还是改良思想的范畴。在风气尚未大开的近代中国,其实现的希望又是何其渺茫。当然,此时的容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三

满怀对祖国趋于文明富强的热望,在倡导留学和办洋务宣告失败后,容闳痛定思痛,进而意识到“于中国根本上之改变”乃“不容稍缓之事”^{[1] (P110)},于是投身维新大潮,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领袖频繁往还,寄望于通过变法谋求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一时之间,他在北京的寓所“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但那拉氏等发动的一场政变,使他们怀抱的革新中国的美好希望再次化为泡影。但容闳并没有因此停下求索救国道路的脚步。当唐才常在上海以“自立军”为核心组织“中国议会”时,他又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进去,并被推选为会长。之后,容闳在思想上逐步由“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在政治上由依靠清政府进行维新,转向支持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在生命的旅程行将走到尽头之时,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僵卧病榻的他为之心潮难抚,即嘱咐两个已在美国立业的儿子回国为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效力,完成其未竟之业。

综观容闳的一生,大体上是沿着洋务——维新——革命的路向不断实现跨越的。令人不能不感佩的是,在每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他都能透过迷雾,把握历史发展的走向,触摸到时代发展的脉动,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前行。容闳,近代这位最早从世界看中国的杰出的爱国者,其不懈求索的光辉一生,竟神奇地契合了近代百年中国历史演变的轨迹。容闳的一生象极了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浓缩版!

近代中国危难迭起,外患日亟。抗御外侮,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面临的迫切任务。但是,国人在探求救国出路时,往往因为过分沉湎于反抗侵略而对师法先进于我的西方的必要性缺乏理性认识。而容闳以其超越前辈的卓识,清醒地认识到反对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的辩证关系,并且身体力行,在坚决抗御外侮的同时,积极倡导以西学改造中国,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致力于近代化运动的推进。

而这一切正根源于他的世界眼光,容闳不愧为近代从世界看中国的爱国者的杰出代表。他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不平凡经历及其寄寓的心忧家国的赤子情怀,注定会为后人无限崇敬和景仰。容闳的名字将与其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西学东渐事业一起载于史册中。他的自传被译为《西学东渐记》也是恰当的。

参考文献:

[1] 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中华书局,1927.